

近現代漢字改革方案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周萍

摘要：文字是處於不斷發展變化過程中的符號體系。從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拉開了中國近百年文字改革的序幕。這期間文字改革與社會變革、政治運動、政府引導等因素密不可分。譬如，現今已很少有人提及漢字的發展方向是走拼音化道路，但在之前的百餘年間這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通過考察盧懋章的切音字運動、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建國後漢字簡化方案、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歷史軌跡，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文字發展的規律與其影響因素，也可為以後漢字的發展與規範提供更為科學的理論指導。

關鍵字：漢字改革；切音字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漢字簡化；拼音方案

在古代，漢字被認為是神聖的。《淮南子·本訓》說：“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漢字的發明是驚天動地的大事。在之後的幾千年裡，中國人一直尊崇漢字與認識習得漢字的讀書人。但到了晚清，伴隨著西方強大的科技技術展示以及中西在戰爭中的勝負懸殊對比，西方先進以及中國落後成為當時的一種普遍觀念。在這種大背景下，中國語言文字也被認為是落後的，需要改革或者改良。

此後的一百多年裡，中國人在漢字改革方面進行了各種嘗試。這一百多年間的文字改革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從制度上改革，廢除漢字，實行拼音文字；另一種意見只贊成進行文字的調整和改進包括簡化漢字和整理漢字，推廣普通話，以中文拼音方案為漢字的輔助工具。我們從百年歷史中提取三個重要時段的改革方案來加以回顧與分析，即盧懋章的切音字運動、新文化運動期間的國語羅馬字運動以及建國後漢字簡化方案和拼音方案。通過考察這三種不同類型文字改革的歷史軌跡，希望可以更為清晰地認識文字發展的規律與其影響因素，也可為以後漢字的發展與規範提供更為科學的理論指導。

一 盧懋章的切音字運動

“中國人民很早就要求把他們自己的文字改稱更容易認、容易記、容易些、容易讀。……近六十年以來，隨著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的產生和發展，文字改革這一問題也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①清朝末期，正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第一次高漲的時期，這個問題自然為了適應社會革命的需要而突出起來。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盧懋章提出第一種切音字方案。盧懋章指出：“溯自黃帝時倉頡以象形、指事、會意、轉注、形聲、假借造成為字以來，至今已有四千五百餘年之遙，字體代變；……皆趨易避難也。”^②他希望利用“字劃一律”“筆劃簡易”的拼音文字來節省學習文字的時間，使全國“男女老幼”都能“好學識理”，從而研究“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求得國家的富強。^③經過10年的潛心研究，盧懋章創造了一種拉丁字母筆劃形樣的“切音新字”，並編撰了歷史上第一部專門研究“切音字”的著作《一目了然初階》。在該書中，盧懋章擬定了中國第一套切音新字的拼音方案，並提出了進行漢字改革的主張，提倡漢字拼音化。

盧懋章系統地論證了切音文字的優越性，即：1、容易學，“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2、容易識，“字話一律，則讀於口遂即達於心”；3、容易寫，“字畫簡易，……亦即易於提筆”。^④這裡，在中國近代漢字改革的歷史上，他頭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中國文字國際化的思想。1892年5月，該書在廈門出版發行，不僅得到了當時教育界的積極支持，還深受旅居福建的外國人的喜愛，將其

① 吳玉章：《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1955年10月15日在第一次全國文字改革會議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新華月報》1955年11月號。

② 盧懋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拼音文字史料叢書”影印第1版，第2頁。

③ 盧懋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第3頁。

④ 盧懋章：《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一目了然初階》，第6頁。

視為學習廈門話的必讀本。基於此，1892年被視為中國切音字運動的起始年，這說明了盧懋章在中國漢字改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1898年，在維新運動的影響下，當時社會掀起了“除舊佈新”的高潮。為此，清政府頒佈了獎勵新著作、新發明的法令，以迎合當時“除舊佈新”的呼聲，進而達到穩定統治的目的。此時，盧懋章所推崇的切音字得到了清工部林紹存欣賞，他上奏請求在全國推廣切音字，並對盧懋章予以嘉獎。此奏得到了光緒皇帝的重視，下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調取盧懋章所著之書，進行詳細考究，並據實上奏。對於盧懋章來說，這是在全國推廣切音字的好機會，但可惜的是，戊戌政變爆發，推廣切音字沒有了下文。時隔7年之後，盧懋章依據當時皇帝的諭旨，親自從廈門趕赴北京，向當時的外務部呈交了切音字著作《中國切音字母》，請求其在全國推廣切音字。但頗多波折之後，經譯學館一番考察之後，認為盧懋章的《中國切音字母》一書有多處瑕疵，不宜在全國推廣。

盧懋章是中國近代漢字改革的第一人，是清末切音字運動的先驅，可以說，沒有盧懋章，就沒有清末的切音字運動，更沒有中國近代的漢字改革。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一書中，中國語文現代化就是以1982年盧懋章的《一目了然初階（中國切音新字夏腔）》的出版為開端的。^①一方面，盧懋章創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拼音方案，極大地推進了漢語的推廣進程。清末時期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關鍵時期，正是盧懋章所創立的拼音方案，為外國人學習漢字提供了便捷條件。另一方面，盧懋章編寫的多本切音字專著，為當時的切音字運動提供了最可靠的理論支撐。他的切音字專著問世之後，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使得他們深刻認識到漢字改革迫在眉睫，他們以盧懋章的切音字專著為藍本，開始編寫各種類型的切音字專著，共同推進了切音字運動的發展。

二 國語羅馬字運動

作為一次“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成員在對待漢字的態度上大抵相似。他們大都認為中國的未來必將廢除漢字。魯迅說：“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眾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只有自己死。”^②《新青年》4卷4號的通訊欄曾討論清末語言學領域提出的漢字存廢問題，錢玄同給陳獨秀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錢玄同提出：“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又不可不先廢漢文。”^③陳獨秀回信說：“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但漢字廢除非常困難，阻力非常大，作為過渡，“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④胡適的回答是：“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⑤由此可見，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們其實是認同清末民初語言學家提出的改革或改良漢字的觀點，但他們認為這種改革非常困難，應有更具有操作性的、過渡性的、妥協性的方案，即，保留漢字，但放棄文言文，發展白話。

1923年，國語研究會所編《國語月刊》出版特刊《漢字改革號》，使漢字改革的討論達到高潮。特刊發表了錢玄同的《漢字革命》、黎錦熙的《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趙元任的《國語羅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的《漢字改革說》等。錢玄同批判清末開始的切音字運動不主張廢除漢字是“灰色的革命”。其他論文也都主張廢除漢字，採用拉丁字母，為制定國語羅馬字和開展國語羅馬字運動在理論上和技術上打下了基礎。

同年，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第五次常年大會上，錢玄同提出《請組織國語羅馬字委員會方案》，黎錦熙、黎錦暉、汪怡連簽署。後來，大會決議組織了“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錢玄同、黎錦熙等11人為委員。^⑥從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經過22次討論之後，《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

①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北京：語文出版社，1997年。

② 魯迅：《關於新聞自——答問》，《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65頁。

③ 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錢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62頁。

④ 陳獨秀：《四答錢玄同〈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陳獨秀著作選編》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0頁。

⑤ 胡適：《答錢玄同》，《新青年》第4卷第4號，1918年4月15日。

⑥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第38頁。

由國語羅馬字拼音研究委員會決議通過，呈交當時的教育部。1926年9月，教育部國語統一籌備會發出佈告，確定印發《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並宣佈“定此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與注音字母兩兩對照，以為國音推行之助。”這是第一次由政府正式公佈國語羅馬字。^①

國語羅馬字運動以批判漢字為出發點，主張採用羅馬字母制定拼音文字以取代漢字，是新文化運動思潮在文字改革領域的延伸。國語羅馬字運動主要從這幾個方面批判漢字：一、漢字是封建文化的象徵。要想廢除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就必須首先廢除漢字；二、文字力求簡便，漢字難學；三、漢字野蠻。

在批判漢字的同時，提倡國語羅馬字運動的學人也批判切音字運動在文字改革中未能徹底否定漢字。在字母選擇上，國語羅馬字運動也反對清末切音新字以及注音字母等漢字筆劃式字母，主張採用羅馬字，認為“採用羅馬字是採用拼音文字最自然的一個辦法”。^②此後又出版發行了一些說明國語羅馬字拼法的書刊，如《國語羅馬字常用表》等。

與切音字運動相比，國語羅馬字運動已開始注重學理上的思考，如借漢字的歷史演變證明拼音化具有內在的歷史基礎——“漢字是由象形而表意，由表意而表音；到了純粹標音的假借方法發生，離開拼音，只差一閤了”。^③並從拼寫單位的確定、如何減少同音詞等技術層面為國語羅馬字方案的制訂進行了實踐探索。但是，與切音字運動一樣，國語羅馬字運動也不僅僅是一場文字變革運動，其根本目標在於摧毀以孔學為代表的封建文化，將漢字視為專門記錄封建文化的野蠻符號而加以無情地批判、拋棄。事實上，文化的性質並不同於文字的性質，漢字既可以用來記錄傳統舊文化，也可以用於宣揚新文化，不能以文化的先進與否作為判定文字先進與否的標準。

三 建國後漢字簡化、拼音方案等改革措施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指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源泉。”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抗戰時期拉丁化新文字在陝甘寧邊區進行了推廣試驗。但受戰爭環境所限，也由於新文字本身不標聲調等缺陷以及新文字運動幹部的缺乏，1944年拉丁化新文字運動宣告暫停。

1949年10月10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成立。1952年2月5日，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上，馬敘倫主任傳達毛澤東主席的指示：“文字必須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應該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據據現有漢字來制定。”因此，“研究並提出中國文字拼音化方案”就成為文字改革的中心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擬訂拼音化方案過程中，拼音文字的形式、作用都發生了根本變化。

新中國初期，以吳玉章等人為代表的拉丁化文字宣導者認為“漢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來代替”，因而在各地開展了試行拉丁化新文字的活動。後來吳玉章等人認識到拼音化需要一個過渡期，於是在1955年10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提出：中文拼音文字方案“首先作為普通話的教學工具，不作為拼音文字”。^④可見，拼音文字的功能已發生了根本改變。

歷經幾番周折，1958年2月1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五次會議通過《關於中文拼音方案的決議》，決議說：“《中文拼音方案》作為幫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應該首先在師範、中、小學校進行教學，積累教學經驗，同時在出版等方面逐步推行，並且在實踐過程中繼續求得方案的進一步完善。”^⑤中文拼音方案，這是我國首次由國家立法機關頒佈的文字改革方案。它具有絕對的法律效力。很多人注意到這套草案的名稱發生了變化，原來的“拼音文字方案(草案)”中的“文字”二字被刪掉了。這樣就由“《拼音文字方案》”改變為“《中文拼音方案》”。其實，這一名稱的變化，隱含的是拼音在文字改革理論和實踐中作用的根本轉變。我們可以看到決議裡是說該方案是幫

① 費錦昌主編：《中國語文現代化百年記事》，第43頁。

② 林語堂：《國語羅馬字拼音與科學方法》，《林語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88頁。

③ 錢玄同：《漢字革命》，《錢玄同文集3：漢字改革與國語運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8頁。

④《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檔彙編》，北京：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秘書處編印，1955年，第117頁。

⑤ 鄭慧生：《中國文字的發展》，洛陽：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79頁。

助學習漢字和推廣普通話的工具，而且周恩來總理於1958年1月10日在向全國政協所做的《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中也明確說明，中文拼音方案“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但當時的一些執行者卻非要用此拼音來代替漢字，一時大街小巷出現的是拼音招牌、路標，在一些少年兒童報紙、雜誌上還出現了不用漢字的拼音字文章。然而以拼音代替漢字的作法是行不通的，想用拼音來代替漢字的做法很快就偃旗息鼓，上世紀60年代以後，文字拼音化的改革呼聲漸弱。

新中國建立後不久，政府有關部門就著手進行漢字的簡化。1951年教育部社會教育司擬出了《第一批簡體字表（初稿）》，收簡體字555個。1952年2月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以《第一批簡體字表（初稿）》為基礎進行增刪，擬出《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一稿，收簡體字700個。後經過多次討論和修改，於1954年9月形成了《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第五稿。1954年11月文改會對第五稿再做修改，形成《漢字簡化方案草案》。1955年2月《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中央一級報刊上發表，向全社會徵求意見。到同年的7月，文改會收到各界群眾的意見5167件，其中97%表示贊成。1955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議批准了漢字簡化的方針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通過了《漢字簡化方案修正草案》。修改後的草案又經國務院漢字簡化方案審定委員會的審定。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第23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公佈〈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1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國務院的《決議》和《漢字簡化方案》。該方案收515個簡化字和54個簡化偏旁。《漢字簡化方案》公佈後，分四批推行，推行十分順利。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裡指出：“方案公佈後，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採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1964年文改會根據國務院指示的精神，編輯出版了《簡化字總表》，收錄了《漢字簡化方案》裡的簡化字和在《新華字典》的範圍內通過偏旁類推簡化得到的簡化字，作為使用簡化字的統一規範。根據2004年公佈的中國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得到的資料，平時主要寫簡化字的占95.25%，寫繁體字的占0.92%，繁簡兩體都寫的占3.84%。簡化字在民眾中已經紮下了根，漢字進入了簡化字時代。《通用規範漢字表》堅持了漢字簡化的方向，按照《簡化字總表》的規定，凡是應當簡化的都做了簡化。

四 近代百餘年文字改革的影響因素與反思

近代以來的中國文字改革思潮和實踐，自清末切音字運動，到五四新文化時期的國語羅馬字運動，再到建國後的文字改革方案制定等，可謂此伏彼起。每個階段的改革方案都有其特定的背景與成效。漢字改革是一個極其複雜、困難的課題，它的行止成敗也絕不是某些個人、某個黨派團體或某個政府的主觀意願所能簡單決定的。當某個政府明令禁止簡化字時，幾百年來民間形成的簡筆字卻仍在人們手頭流行。當某個政府明令要求推行某個簡化漢字方案時，卻遭到人們的拒絕，並導致流產。只有把漢字作為一門科學的物件來加以審慎、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理性、科學地對待漢字改革。

切音字運動是個人奮鬥、朝廷路線和民間推行三者結合，具有改良主義政局中切音字運動的實踐活動的特點。其中，在戊戌變法之前，主要是盧戇章的個人奮鬥為主；後來切音字運動進入朝廷，朝廷路線與個人奮鬥相結合；再後來，民間設立“官話字母義塾”，主要是民間推行了。個人奮鬥在當時的封建社會，很難有實際成效。而朝廷路線由於當時的政府岌岌可危，也不能奏效。而民間推行，從今天來回顧歷史，可以說造成了切音字運動後十年的一個空前景氣的局面。但運動的最後結局是清攝政王載灃查禁了官話字母。從方案上看，當時的運動還處於語言科學的不成熟階段。如字母形體過於複雜奇怪，難以記憶。

國語羅馬字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文字改革領域的延伸，提倡、制定、推廣基本上局限於知識份子的小圈子，由於當時的政府對推行並不真正熱心，加上該方案拼寫規則繁瑣，國語羅馬字始終沒有越出知識份子的圈子。1934年以後，推行活動走向低潮，國語羅馬字的社會影響並不大。

清末的切音字運動和國語羅馬字運動總體上是失敗了，在那個時代，要有領導、有組織地進行中國文字改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政權穩定，人們豐衣足食的情況下，通過國家在經濟、制度各方面都大力支持下，才有可能完成文字改革。經過百年的反復探索和實踐，清末關於漢字改革的目標在當今都可以說實現了，漢字簡化並推行了中文拼音方案。

從百年漢字發展與改革的歷史縮影來看，影響漢字發展的因素可以分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內部因素是語言文字的自身發展規律，外部因素是社會的影響。

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系統，它的特點必須以適應語言為前提。一種文字如果不適應記

錄語言，那麼它早晚都會被改造或者拋棄。這是影響文字的內部因素。在清朝末年，漢字的改革首要原因就是它已不適應當時通用語的發展需要。

有人會說文字的發展規律遵循著表形—表義—表音的方向發展。印歐語自不必提，包括日語、獨立後的越南文字都變成了表音文字。而漢字在漫長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也有“表音化”趨勢。這是指這樣一種觀點：漢字的造字方法從象形、指事、會意向形聲發展，形聲之前的幾種造字方法都是純表意的方法，而形聲方法中出現了表音因素，形聲方法的產生並大量用來創造新字，顯示了漢字從表意向表音進化的規律。當今世界除漢字外幾乎所有文字都採用拼音制度，正表明了這一規律。基於上述觀點，在過去一個較長的時期裡，要求對漢字進行徹底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成了我國文字工作唯一正確的指導方針。那麼漢語為什麼走拼音化的道路沒有成功？

在世界文字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可以發現有兩類不同發展軌跡的文字：“自源文字”和“借源文字”。^①“自源”文字發展的語言環境沒有發生劇烈的變化，文字發展是漸進式的前進進化，如我國的漢字。周有光先生總結“自源”文字發展有三個階段：見形知義，見形知音，見形知音義。^②漢字的發展正是經歷了這三個階段。當“自源”文字向外傳播，語言環境的劇變使字形與字義的聯繫脫節，於是“借源”文字突變為表音文字是必然的。在“借源”文字突變為表音文字之後，它的發展規律如同“自源”文字一樣遵循著漸變式的前進進化。所以表音系統的簡化和規範化發展的結果是，詞彙構成方式趨向一致，就是詞根與詞綴的搭配。從世界文字發展歷史上看，文字的意音制度與拼音制度，是跟文字的自源性與借源性嚴格對應的，也就是說，文字的發展方向取決於文字的自源性與借源性。

綜而言之，由於民族傳統的力量，所有自源的也即意音制度的文字都與本源民族社會保持共存的關係，因而總是相對穩定、不易變革的，所有借源的文字，由於缺乏民族傳統的支持，因而是易變的，並且幾乎是全無例外地向表音制度變化。這就是決定文字發展方向的最根本原因。

當文字不適應記錄語言，需要進行文字改革時，這時的外部因素就會發揮巨大的作用，如專家制定、政府推動、民間配合等。胡範鑄教授曾經提到，語言文字是一種社會制度，根據制度經濟學的基本觀念，任何社會制度的變革都有一個“路徑依賴”的問題，所謂“路徑依賴”是指“事物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人們一旦選擇了某個體制，由於規模經濟、學習效應、協調效應以及適應性預期等因素的作用，會導致該體制沿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得以自我強化。路徑依賴意味著人們過去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任何體制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社會環境。”^③語言文字的社會應用性很強，如果進行改革，那麼就要考慮改革帶來的巨大成本。所以，反思百年文字改革，只有在建國後國家穩定並在經濟、制度各方面都大力支持下，才能完成最終的文字改革。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展望未來漢字發展的方向，作為“自源”文字，漢字不僅能夠很好地記錄漢語，而且便於貫通古今漢語、溝通各地方言，對保存和傳承歷史文化、保持漢語和國家的統一以及社會的穩定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從這些方面來看，漢字的發展在可預料的未來不會走拼音化的道路。社會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也在漢字繁簡之爭上給出答案，漢字如果在上世紀50年代沒有實行簡化方案，固然在文化傳承、兩岸交流等方面具有種種便利，但是，如果因此而在“一簡”已經使用幾十年的情況下，廢止“一簡”，那無疑是一場災難。所以“棄簡識繁”的思想也萬萬不可取。而且，資訊化時代給我們漢字的使用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如海峽兩岸文字制度雖然不同，但在電腦上漢字簡繁文本智慧轉換系統已經比較成熟，並在社會上廣泛應用。

21世紀的中國社會語言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用字的範圍發生了很大的變動，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文字觀念和需求，出現了多元化、開放性的特點。如1990年開始大量的字母詞出現，有專家就呼籲要限制字母詞，維持漢語的純潔性。事實證明，隨著時間的推移，字母此並沒有呈井噴式增長，反而一直是一個穩定的數量，說明語言文字自有其發展規律，當需求達一個飽和的階段，自然不會增加。現在，資訊化的快速發展不僅使我們的用字範圍比以前擴大，而且還有一個實現標準化的要求。標準化的要求在各個領域都能體現出來，比如，新聞出版、廣播影視廣泛使用電腦，出現許多新媒體，這都需要文字實現數字化。漢字實現數字化以及繼續推進規範化，

① 李葆嘉：《論語言類型與文字類型的制約關係》，《南京師大學報》1990年第4期。

② 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 胡範鑄、陳家璠：《專家筆談-關於〈通用規範漢字表〉研製及相關問題的討論》，《長江學術》2009年第4期。

是未來語言文字工作者所需要面對的重要任務。